

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第9窟的建成时间

李 军

内容摘要：莫高窟第9窟的营建与晚唐归义军政权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为学者所关注。根据窟内李氏家族供养人题记的情况，可证洞窟建成于李弘愿被清除之后、李弘定等人被杀之前。再结合张承奉称号的变化情况，可以确定该窟应建成于乾宁四年（897年）二月至光化元年（898年）之间。第9窟中张承奉所谓检校司徒及使相的称号均系其自称，而非索勋所授予。

关键词：莫高窟第9窟 供养人题记 建成时间

莫高窟第9窟为晚唐时期敦煌地区所营建的重要洞窟。对于第9窟窟内壁画的题材，梁蔚英先生曾做过细致的考证。^[1]第9窟甬道南北两壁绘有唐代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之孙张承奉、归义军节度使索勋、瓜州刺史李弘定、沙州军使李弘谏等人的供养人画像，反映了张、索、李等大族此时在归义军政权中的权力分配状况，为学者所关注。由于窟内没有明确的建窟题记，且敦煌文献中没有发现与其相对应的造窟功德记，所以，学者在探讨第9窟建成时间问题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甬道内张承奉等供养人题记中的职衔。但由于侧重点不同，学者之间尚存在不小的分歧。目前为止，对于第9窟建成的时间，向达、唐长孺等先生将其系于索勋出任节度使期间（892~894）；钱伯泉和李正宇先生则认为应在索勋死后，但在具体时间上两者之间仍有差异。^[2]最近，张景峰先生利用李弘定和李弘谏结衔的情况，对第9窟供养人画像的绘制时间也进行了研究。^[3]而第9窟建成时间的确定，不仅可以为相关的敦煌文献提供可靠的时间坐标，此外还有助于晚唐归义军政权内部张、索、李等家族政治斗争疑案的破解，故亟待澄清。

莫高窟第9窟甬道北壁第一身供养人题名作：

.....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食.....实.....万户侯赐紫金袋南阳郡开国公张承奉一心供养

第二身题名作：

.....瓜州刺（史）.....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李弘定一心供养

甬道南壁第一身供养人题名作：

敕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右散骑常侍兼

(御)史大夫索勋供 (养)

第二身题名作：

朝散大夫沙州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李弘谏一心供养^[4]

总的看来，对于第9窟李氏兄弟供养人题名的时间，目前学术界倾向于乾宁元年十月之后，而对于张承奉及索勋供养人题名的时间则存在较大的分歧。^[5]对于张承奉题名结衔中所带的“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包括向达、唐长孺、荣新江等先生在内的多数学者认为应是索勋执掌归义军期间所给予的虚衔，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故张承奉及索勋的题名应写于索勋当权时期。但笔者认为第9窟张承奉“司徒”等称号为索勋所赠予的推论尚存不少疑点。首先，如果张承奉的职衔确为索勋所赠予的虚衔，则很难解释为何在第9窟的甬道中张承奉被绘于位置更为显赫的北壁，而已受到唐政府节度使册封且身为张承奉姑父的索勋反而屈居南壁。其次，在张承奉之前，归义军节度使中唯有张议潮生前使用过司徒称号，^[6]张承奉之父张淮鼎虽然曾以节度留后代行节度事，但死后仅被唐政府追赠为检校户部尚书。^[7]索勋上台后，在已获唐政府正式册封的情况下，也只能使用将军、大夫、常侍等较低的称号。所以，索勋在获得合法地位后即使要掩人耳目，似也没有必要给予张承奉“检校司徒”如此高的称号。而更为重要的是，张承奉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使相”的称号也不是索勋所能给予的。再次，乾宁元年十月所立的《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末张承奉的职衔仅记作“沙州刺史兼沙瓜西等州节度使御史大夫”。^[8]如果张承奉在索勋统治时期已有“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食……实……万户侯赐紫金袋南阳郡开国公”的职衔，何以《李氏再修功德记》中对其散官、勋爵、服色等均付诸阙如？这就可以反证其“检校司徒”等称号并非得自索勋时期。所以，虽然索勋和张承奉供养人题记在第9窟同时出现，但不足以证明两者作于索勋统治时期。

而对上述观点持赞成态度的学者，在论证上述问题时，主要的根据是窟内索勋供养人题记中的“常侍”称号。景福二年九月索勋尚在使用常侍称号，所以，如果我们能明确索勋由常侍改称尚书的时间，则可以为第9窟中索勋供养人题名的时间提供重要参考。

根据莫高窟第196窟及第98窟的索勋供养人题名，我们可以确定索勋确实曾被称为尚书。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敦煌文献中，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其称尚书的记载。所以，对于索勋改称尚书的时间下限，我们只能根据第98窟及第196窟的修建年代做一大致判断。

第98窟甬道北壁第三身索勋供养人题记作：

敕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兼御史大夫守定远将军上柱国巨鹿郡索勋一心供养。^[9]

据学者研究，第98窟为曹氏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曹议金主持营建而成，也即曹议金的功德窟，建成时间应在后唐同光年间（923~925年）。^[10]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言，第

98窟有浑子盈的题名，而其阵亡于同光三年六月之前的归义军征甘州回鹘之役，所以同光三年六月可以视为第98窟建成的时间下限。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196窟的情况。第196窟甬道北壁第一身索勋供养人题记作：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等使守定远将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巨鹿郡开国公食邑贰仟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11]

对于第196窟建成的时间，此前学术界多认为是在索勋任归义军节度使期间（893~894年）。^[12]2000年，土肥义和先生在利用敦煌文献对第196窟主室5名供养人比丘的生活年代进行考察后，认为第196窟应创建于925年到980年之间，而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893~894年；甬道北壁的索勋父子像应是他们死后才绘画上去的，因此不能作为开窟年代的凭证。^[13]但土肥氏在否定传统观点的同时，又面临着一个难题：根据敦研322《辛亥年（951）腊八燃灯分配窟龕名数》的记载，此时第196窟（何法师窟）已经建成；但甬道南壁与索勋相对的曹元忠在962年才被宋太祖补授为节度使，由此，第196窟又当建于962年之后。针对上述矛盾现象，2004年，梅林先生指出第196窟存在创建及重画、补画两个阶段：第196窟创建于索勋在位时期，但并未完工；964年之后，由何家僧人主持续修，抹去了甬道北壁上的何法师像，而代之以索勋父子。^[14]2006年，梅林先生又对此前的观点进行了修订，认为索勋之像仍应画于其当权之时。^[15]此外，梅林先生还接受了萧默先生的观点，认为何法师在893年稍前开凿了第196窟，后来为了庆祝索勋正式成为归义军节度使，所以不惜将自己的供养像抹去换上索勋，时间在893~894年。但第196窟中索勋所检校之“吏部尚书”要高于第98窟中的“刑部尚书”，^[16]可证第196窟中索勋供养人画像完成的时间要晚于第98窟，据此，笔者认为梅林先生此前所提出的第196窟索勋题名作于10世纪中叶的观点似更为可取。

由此可知，虽然在第196窟的供养人题名中，索勋被称为尚书，但由于此题名可能晚于第98窟索勋的题名时间，所以，第98窟中的索勋题名也就成为目前所知索勋被称为尚书的最早实例。既然索勋由常侍改称尚书的时间下限已晚至同光三年六月，那么索勋的常侍称号就有延续到五代时期的可能。如此，根据第9窟中索勋的“常侍”称号也就不能证明索勋的供养人像与题名作于其统领归义军时期。

此外，虽然敦煌文献中并没有张承奉称司徒、同平章事的直接记载，但还是留下了可资旁证的蛛丝马迹。罗福颐辑《沙州文录补》收有《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张宝山状》及张宝山上相公、大将军的两通《封书样》，现录文于下：

张 残书状

（上缺）日，宝山蒙（约缺七字）体何似？伏惟善加（约缺四字）著物色，孤镇地无所出，前件 黄蟠、菌子，乞垂容纳。不宣，谨状。

月日具官衔。张 状上（名上加新城朱记印）。

常侍阁下。谨空。

.....

封书样

新城镇状上相公衙。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张宝山状。谨封。

.....

封与大将军书样

谨谨上郎中阁下。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张宝山状封。^[17]

对于状文中的“张宝山”，学者多认为其与 P. 3518《张保山邈真赞》所载的张保山为同一人。^[18]在第一件封书样中，张宝山自称“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由新城镇状上相公衙。张宝山所署职衔中没有特别标出“归义军”等字样，可证状文所上的相公应为归义军内部，而非外镇。在唐代，只有身兼宰相职的人才能被称为相公。而在唐中宗以后，唯有侍中、中书令及带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才是真宰相。张宝山出任新城镇使的时间大致在唐天复元年（901年）六月至后梁开平三年（909）十月间，^[19]而此时归义军中并未有加侍中或中书令者，所以此位相公只能指自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张承奉。这也就进一步证明第9窟中张承奉的“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称号并非索勋所赠而是其自称，使用的时间已在索勋卒后。

相对于第9窟张承奉和索勋，同窟李弘定、李弘谏兄弟的供养人题记对于第9窟建成时间的判定更为有利。钱伯泉先生据 Jx. 1435《乾宁二年（895年）归义军节度副使李弘愿牒》的记载，指出乾宁二年十月十日李弘愿以归义军节度副使的身份行使权力，而第9窟甬道已没有李弘愿的供养人题名，表明第9窟建成时李弘愿已不在人世，^[20]这也就证明同窟中张承奉等人的画像应绘于李弘愿死后。此外，乾宁四年二月，张承奉尚自称将军，^[21]而在第9窟张承奉题名中已有“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号，所以，张承奉等人供养人像及题名又当作于乾宁四年二月之后。

对于第9窟甬道未出现李弘愿供养人题名的特殊现象，李正宇先生指出李弘愿已被张承奉所排斥，并进一步推测：“索勋被杀，李弘愿可能是主谋，张承奉为抑制李氏势力并缓和张氏懿亲各派势力的尖锐矛盾以自固，乃为索勋平反，只除掉弑勋祸首李弘愿一人，而对诸李不予牵连，反而特视亲和，保留了李弘定、李弘谏的官职。”^[22]李先生的结论合情合理，可从。这也就反证在第9窟建成时，李弘定、弘谏兄弟尚在人世。而据 S. 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光化三年（900年）六月九日李明振妻张氏曾为“亡男使君、端公、衙推”等“三郎君”写经荐福。对于文书中的“三郎君”，孙修身、卢向前、李正宇等先生均认为应单指张氏第三子李弘谏，^[23]荣新江先生则指出使君、端公、衙推从官制上看很难合指一人。^[24]确如荣先生所说，如果“三郎君”确指李弘谏，似没有必要以“使君”、“端公”、“衙推”三个本没有联系的官职称之。而据第9窟李弘谏的题名，可知其在光化三年之前已不称甘州刺史，而改称沙州军使，“使君”的称号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将“三郎君”视为李明振的三个儿子更为可靠。既然时任瓜州刺史的李弘定和沙州军使的李弘谏兄弟的题名出现在第9窟，证明第9窟的建成应在光化三年六月九日之前。

根据《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的记载，光化三年八月，张承奉被唐政府册封

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25]由此，在乾宁四年至光化三年之间，张承奉似乎并没有称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空间。但据学者研究，在金山国建立之前，张承奉曾一度自称金山王。所以，如果我们能明确张承奉称金山王的时间，就可以为其司徒称号的使用时间及第9窟的建成时间提供重要参考。

P. 4640《己未年至辛酉年（899~901年）归义军军资库布纸破用历》第181—182行载，庚申年（900年）六月“十七日，金山传处分，楼上纳粗纸壹帖”。对于此处之“金山”，郑炳林先生认为即时称金山王的张承奉，其称王应在900年之前。^[26]杨秀清先生据P. 4044《修文坊巷社再缉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中“奉为我拓西金山王永作西垂（陲）之主”的记载，指出张承奉在建立金山国之前已称“金山王”及“拓西金山王”，时间应在光化三年（900年）至天复四年（904年）之间。^[27]冯培红先生则据P. 3718《张良真邈真赞并序》及P. 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的记载，进一步证实张承奉登基之前已称金山王，并认为张承奉始称金山王的时间大约在900年前后。^[28]除学者上举资料外，P. 3518《张保山邈真赞并序》、P. 3718《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也均有关于“金王”或“金山王”的记载，而“金王”、“金山王”或为“拓西金山王”之简称。

P. 3718（3）《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载：

公字良真……故主司空称愜，荐委首乡大官；久岁均平，广扇香风御众。故得民谈美训，俗嘉严恪之威。金山王时，光荣充紫亭镇主……仍充应管内外都牢城使。自居崇列，才经三五之秋。^[29]

此件写真赞作于后唐天成四年（929年）二月一日。对于文中的“故主司空”，荣新江先生指出应指张承奉，证明张承奉在称金山王之前，曾使用司空的称号。而据序文可知，张良真在张承奉称司空时，被委任为乡官；在张承奉称金山王时，被任命为紫亭镇主；收复楼兰三城后，又被任命为都牢城使。对于文中“故主司空”和“金山王”两个称号，荣新江先生指出：“故主司空和金山王两个称号之间没有其他称号，也就是说，司空是张承奉建金山国之前的最高称号。”^[30]这也就侧面证明张良真充“紫亭镇主”应在张承奉称金山王时。据写真赞之赞文，张良真“偏优镇将，二八余年”，可知其充紫亭镇使16年；据序文，张良真充都牢城使为“三五之秋”，即15年。由写真赞所作的929年前推31年，可知张良真出任紫亭镇主应在898年，而张承奉此时应已自称金山王。

此外，李正宇先生从P. 3633《龙泉神剑歌》原稿涂去部分中揭出“自从登祚十三年”等文字。对于“登祚”一词，李先生指出可以指皇帝登基之外，又可以指官职进位。^[31]杨秀清先生也指出文书作者涂去“自从登祚十三年”一句，是由于创作需要，而不是要抹杀这一历史事实。^[32]李正宇先生的发现，为我们确定张承奉称王的时间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据学者考证，P. 3633《龙泉神剑歌》作于辛未年（911年）七月初左右，^[33]由此前推13年，证明张承奉此次“登祚”应在898年。乾宁三年（896年）

七月,唐昭宗在李茂贞的军事威胁下,被迫出幸华州。至光化元年(898年)八月,始由华州返回长安。目前,我们并没有发现张承奉曾在此年受到唐政府册封的记载,所以P.3633《龙泉神剑歌》所载的张承奉此次“登祚”并非仅仅指普通的官职晋升,而应是指张承奉于898年僭称金山王而言。

据上文所考,第9窟当建成于乾宁四年二月至光化三年六月之间。在第9窟中,张承奉犹自称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以第9窟又当建成于张承奉称王之前。据P.3633《龙泉神剑歌》等资料的记载,张承奉僭称金山王应在898年,由此,作为归义军张、索、李等家族政治斗争产物的第9窟应建成于乾宁四年二月至光化元年之间。

根据窟内张承奉等人的供养人题记,曾有学者主张此窟的功德主为张承奉或为张、索、李三家合作。对此,贺世哲先生提出质疑,认为此窟的功德主可能是张、索、李等大族的属吏。^[34]而梁尉英先生在其上引文中,根据窟内的内容题材,指出此窟的窟主当非张承奉,而应是敦煌的李氏家族。对于主室东壁门列北向第三身南侧供养人像之题名,史岩先生录作“亡兄李 ”。^[35]如此录文不误,则可进一步证明第9窟的窟主应为位列张承奉及索勋之后的李氏兄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9窟甬道门口之上相当于造窟功德主的位置,画有男供养人像四身,相对踞跪矮床之上,后侍从各二身。^[36]四身供养人像中三人服紫,一人著青,前两人手持香炉,后两人则双手捧供盘。左侧两身及右侧第二身供养人像后画有榜题,但阙而未写。笔者推测此四人很可能就是第9窟真正的功德主李弘愿兄弟,其中著青者当为李弘愿四兄弟中品阶最低的李弘益。从供养人身后画有榜题而未题的情况分析,第9窟的开凿应在李弘愿生前,但在洞窟行将完工之际,张承奉在沙州大族的支持下,清除掉了李弘愿,所以门上的榜题未及完成。而在张承奉清除李弘愿并为索勋平反的情况下,李弘定兄弟被迫在甬道画上张承奉及索勋的供养人像,自己却只能侧身其后了。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正。张景峰先生经过研究,得出第9窟甬道供养人画像绘制于乾宁三年初至四年六月九日之间的结论。其之所以将乾宁三年年初视为第9窟甬道供养人画像绘成的时间上限,是因为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乾宁三年五月以前李氏家族已彻底垮台。对此,并无太大的异议。但其将乾宁四年六月九日视为第9窟甬道供养人画像绘制时间的下限,却不无商榷之处。张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地狱思想比较严重,时人认为人死之后要经过三周年的冥间审查,之后才可到达转轮王前接受六道轮回。S.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中“神游碧落,联接天仙”一句是张氏祝愿三个儿子灵魂升天,由此判断张氏写经是为了三个儿子三周年之忌而作。由上举文献中“大唐光化三年庚申岁六月九日”的抄写题记前推三年,所以第9窟李氏兄弟画像的时间下限被确定于乾宁四年六月九日。但唐宋时期敦煌当地人去世之后,其家人在头七至七七,以及百日、周年、三周年都会举行斋会,并抄写佛经以作供养。如津艺193《佛说无常经》题记载:“显德五年(958年)岁次戊午三月一日夜,家母阿婆马氏身故。至七日开七斋。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翟奉达忆念敬写《无常经》一卷。敬画宝髻如来佛一铺。每期至三周年、每斋写经一卷追福。愿阿娘托影神游,往生好

处，勿落三途之灾。永充供养。”^[37]又如Φ263+Φ326《亡考文》载：“时即有持炉至孝，奉为亡考么（四）七追念诸福会也……惟愿坐莲台而居上品，乘般若而往西方；食法味而会无，超一乘而登岸。目睹之佛，心悟无生；神游五净之宫，逍遥六天之境。”^[38]虽然上述文献一为亡母头七敬写，一为亡考四七追念，但其中却都有所谓“托影神游，往生好处”或“神游五净之宫，逍遥六天之境”的祝愿之辞，与S. 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神游碧落，联接天仙”描写相类似。其实，类似记载在敦煌抄经题记中屡见不鲜，在此不赘。所以，仅依靠“神游碧落，联接天仙”的描写实不足以证明此经抄写于张氏三子的三周年忌日。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李氏三兄弟中，李弘愿与另外两人的死亡时间并不在同时，所以，李氏三兄弟均死于乾宁三年六月九日的结论恐难成定论，故暂不取。

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张承奉曾被属下称为“相公”，这也就证明在索勋卒后，张承奉确实使用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号。所以，张承奉的“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称号并非索勋所赠而是其自称，使用的时间已在索勋卒后。第9窟中有李弘定、李弘谏，而没有李弘愿题名，可证第9窟建成于李弘愿被杀之后、李弘定及李弘谏被杀之前。再结合张承奉乾宁四年二月仍称将军的事实，可证张承奉、李弘定、李弘谏等人的供养人像应绘于乾宁四年二月至光化三年六月之间，索勋供养人像应与其他三身画像绘于同时。此外，张承奉在光化元年已进称金山王，所以，张承奉使用检校司徒称号的时间又当乾宁四年二月至光化元年之间，而第9窟也应建成于这个时期。

张承奉在乾宁四年二月之后的短短两年之内，称号就由将军升至司徒，并最终称王。但据敦煌文献的记载，天复二年四月之前，张承奉又开始自称尚书，证明其取消了金山王的王号。而至迟在天复四年八月，张承奉又进称司空，并最终于后梁开平四年七月左右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天子。张承奉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自己称号与此后取消王号等反常举动，都与此时晚唐时期全国及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变动相关。但限于篇幅，对于上述问题，笔者只能另文详述。

项目内容：本文属于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唐宋之际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经营措施及影响”（2010JK296）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 梁尉英：《略论敦煌晚唐艺术的世俗化》，敦煌研究院、江苏美术出版社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九窟、第一二窟（晚唐）》，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10~34页。

[2] 向达先生认为索勋执政期间将张承奉引以为副贰，而第9窟中张承奉题名结衔残阙的或即《旧唐书·昭宗纪》光化三年八月所记之节度副使诸官勋。（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同作者：《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424~425页）姜亮夫先生认为此窟应为张氏之功德窟，开凿于大顺二年索勋保辅承奉之际。（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44页）唐长孺先生则认为张承奉之司徒、同平章事称号，乃索勋为安张氏之心而所给予的尊称，而第9窟的题名是在索勋初任

节度使时。(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第275~298页)贺世哲先生根据第9窟中索勋题名中的节度使的题衔,认为第9窟甬道题名当在892年左右。(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荣新江先生也认为张承奉的司徒称号是索勋用以收买沙州人心的虚衔,其题名应与索勋的题名同写于景福二年(893)九月前后。(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1页)需要指出的是,向达、唐长孺、贺世哲等先生在探讨索勋及张承奉题名时间时,似乎对同窟李弘定兄弟的题名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钱伯泉先生认为第9窟为李氏所开,时间在索勋死后。(钱伯泉:《为索勋篡权翻案》,《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68~75页)。李正宇先生则认为第9窟建于天复四年(904)八月至天祐三年(906)之间。(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9页)

[3] 张景峰:《敦煌莫高窟第9窟甬道供养人画像年代再探》,《兰州学刊》2009年第11期,第20~26页。

[4]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页。

[5] 可参钱伯泉:《为索勋篡权翻案》,《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68~75页;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敦煌文献论集》,第114~128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06页。

[6]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60~91页。

[7] 拙稿:《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事迹考》,《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1~14页。

[8]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68页。

[9]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32页。

[10] 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0~272页)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216~219页)马德:《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等文均将第98窟的建成年代系于同光年间。荣新江先生根据窟内曹议金、浑子盈等人题名的情况,考证出第98窟供养人像完工的时间应在同光三年六月左右。(荣新江:《关于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46~53页;又收入氏著:《归义军史研究》,第231~246页)王惠民先生则认为第98窟建成于同光二年(924)中期。(王惠民:《曹议金执政前期若干史实考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425~430页)

[11]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87页。对于索勋题街中的检校官,史岩《敦煌石窟画像题识》(第424页)、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23页)皆作“吏部尚书”;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119页)作“刑部尚书”,张大千《莫高窟记》作“户部尚书”。(张大千:《张大千居士遗著莫高窟记》,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敦煌学文献卷》第9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下册,第285页)虽然《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晚出,但其充分参考了前人的成果,且有地利之便,故索勋题名中检校“吏部尚书”的可能性更大。

[12] 此说由金维诺先生首倡,(金维诺:《敦煌窟龕名数考》,《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5期,第53页)后为藤枝晃先生所继承,(藤枝晃:《敦煌千佛洞の中興——張氏諸窟を中心とした九世紀の佛窟造營》,《東方學報》第35册,1964年,第116~120页)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支持。对于石窟建成的具体时间,金维诺、藤枝晃先生系于景福元年(892)至乾宁二年(894)间;姜亮夫先生系于景福元年;(姜亮夫:《莫高窟年表》,第446页)贺世哲先生认为应在景福二年(893)到乾宁元年之间;《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则认为应在唐景福年间(892~893)。(第77页)《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则将时间系于晚唐。(第86页)

[13] 土肥义和:《论莫高窟中的何法师窟(第196窟)的创建年代——对供养人题记的考察》,“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论文集,2000年,敦煌莫高窟,第54页。但不知何故,此文未收入甘肃民族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的《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14] 在2004年兰州大学召开的“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梅林先生提交了题为《“何法

师窟”的创建与续修——莫高窟第196窟年代分论》的论文摘要（《“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摘要部份）》，甘肃兰州，2004年7月，第3页），并就此在会议上进行了演讲。

[15] 梅林：《“何法师窟”的创建与续修——莫高窟第196窟年代分论》，《艺术史研究》第8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3~432页。

[16] 梅林先生将第98窟索勋之“刑部尚书”视为其最高检校官，并以此否定《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96窟索勋检校“吏部尚书”的记载，而从《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之“刑部尚书”。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录文的总体准确程度似逊于向达、史岩及贺世哲等先生的录文。此外，即使从张大千先生所录的“户部尚书”，也较“刑部尚书”为高，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第196窟索勋之题名应晚于第98窟。

[17] 罗福苕：《沙州文录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编撰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第18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500页。

[18]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316页；冯培红：《归义军镇制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275~276页；杨秀清：《P. 3518 张保山遯真赞 札记》，刘进宝、高田時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3~187页；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8页。

[19] 对于张保山出任新城镇使的时间，杨秀清先生认为应在张承奉任节度使期间，而荣新江、冯培红先生则认为在金山国时期。（杨秀清：《P. 3518 张保山遯真赞 札记》，《转型期的敦煌学》，第184~185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316页；冯培红：《归义军镇制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第275页）据P. 3518《张保山遯真赞》的记载，张保山由长安返回沙州后，被任命为“左马步都虞侯”。而其在左马步都虞侯任上至少“五载有余”之后，曹议金才取代张承奉的统治，所以张保山出任新城镇使的时间应从杨秀清先生所说。如荣新江先生所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应在甲戌年（914）五至十月间，而由此前推“五载”，可证张保山由新城镇使离职应在909年十月之前。而冯培红先生据P. 4640v《归义军军资库布纸破用历》的记载，已证明己未年（899）五月十日至辛酉年（901）六月四日之间，一直是张从武担任新城镇使，所以张保山出任新城镇使的时间大致应在唐天复元年六月至后梁开平三年十月之间。

[20] 钱伯泉：《为索勋篡权翻案》，《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68~69页。而荣新江先生据S. 2263《葬录》卷上序的记载，指出乾宁三年五月之前，李氏家族的统治已彻底垮台。（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07~209页）此外，据P. 2825《平康乡百姓冯文达雇驼契》记载，乾宁三年二月，张承奉曾遣平康乡百姓冯文达入京奏事。从时间上判断，其所入奏的很可能就是张承奉发动政变清除李弘愿之事。而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李弘愿被杀则当在乾宁二年十月至乾宁三年二月间。

[2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92页。

[22] 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2001年，第119页。

[23] 孙修身：《谈与瓜沙曹氏世谱有关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第115~117页；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16页；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敦煌文献论集》，第120~121页。

[24]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10页。

[25] 刘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68页。

[26]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78页。

[27] 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28] 冯培红：《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称号的几个问题》，郑炳林、花平宁主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236页。

[29] 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遯真赞校录并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272页。

[30]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95页。

[31] 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第63~75页。

[32] 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第58页。

[33] 可参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14~26页；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3~85页；颜廷亮：《龙泉神剑歌写作时间和作者小辨》，《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第65~72页。

[34]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

[35] 史岩：《敦煌石窟画像题识》，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98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524页。

[36] 敦煌研究院、江苏美术出版社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九窟、第一二窟（晚唐）》，第87页。

[37] 天津艺术博物馆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38] 《俄藏敦煌文献》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Speculation on Completion Time of the Ninth Grotto of the Mogao Grottoes from Donator's Inscription

by Li jun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inth grotto of the Mogao Grottoe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grasp for Gui-yi-jun Regime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so that it attracts scholars' attention. On the basis of donator's inscription of the Lee family, it is concluded the ninth grotto was built after Li Hongyuan was removed and before Li Hongding was killed. Combining with the change of Zhang Chengfeng's title, we can be sure that the ninth grotto was built between February in the forth year of Tang Qianning (AD 897) and the first year of Tang Guanghua (AD 898). In addition, Zhang Chengfeng's titles which were Jian Jiao Si Tu and Shi Xiang were self-proclaimed rather than granted by Suoxun.

Keywords: the Ninth Grotto of the Mogao Grottoes; Donator's Inscription; Completion Time